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深层动力。建设“文化强国”不仅是技术措施和文化产业的兴建，其核心在于中华文化精神之提倡，中华智慧之弘扬，民族感情之凝聚，在空间上应有所体现。如何充分发挥传统名山文化资源优势，引领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作深入探索，以期对全国有所借鉴。

从地域角度研读庐山文化发展

■ 牛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
秦宁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庐山区位与基本特征

(一)庐山的独特区位
庐山地处江西省北部的鄱阳湖盆地，九江市以南，濒临鄱阳湖畔，雄峙长江南岸，与中国第一水系长江、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形成大山、大江、大湖浑然一体的独特格局。
(二)庐山是人文景观与自然风物完美的结晶
庐山不仅是一座风景名胜山，更是一座文化昆仑，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庐山是人文圣山”。

庐山是中国名山中，最早以文化群体的杰出创造载入中国历史的。以圣人大禹登庐山算起，千百年来，历朝历代，在庐山上道上攀登探索的人，前去后来，绵绵延延，已经形成了一条十分壮观的历史之河，留下了众多千古名言、名诗、名词、名画，并成为隐逸之士、高僧名道的依托，政客、名流的活动舞台，从而为庐山带来了浓郁的文化色彩，并使庐山深藏文化底蕴。庐山的国学，以集“程朱理学”教育精华的白鹿书院为代表，领四大书院之首，影响中国历史近700年；庐山的石刻综合体体现了自然景观同文化景观的紧密结合；东谷别墅群等近代建筑则见证了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

(三)宗教名山
庐山是宗教名山——一山五教，和谐共处。

自公元386年起，慧远主持在东林寺创办“净土宗”以来，庐山就是中外公认的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庐山的宗教文化独特性在于“一山五教”——佛教、道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荟萃庐山，和谐共处，留下了包括寺庙、观阁、清真寺、教堂在内的众多宗教建筑和大量石雕、碑刻、塔筑等宗教文化遗存。

(四)政治名山
庐山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见证了国共两党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确立。蒋介石将庐山作为国民政府的“夏都”，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八上庐山，与蒋介石会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袖人物均与庐山有不解之缘。

二、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定位不准确，对弘扬中华文化、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认识不足

庐山是一座集风景、文化、宗教、教育、国际交流为一体的千古名山，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代表，不仅具有休闲度假、观光旅游、会议等功能，而且在传承与展示中华文化、促进宗教和谐、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庐山被定位在旅游经济功能，而对庐山的文化、历史、宗教等文化资源研究和挖掘不够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以文化为中心、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为弘扬中华文化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新的贡献是庐山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体系

从产业发展来看，庐山存在着产业链条短和产品结构单一、现代文化产业链尚未形成等问题，对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缺乏深刻地认识。庐山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山水文化、宗教文化、西方文化等交流交融，丰富多样，但是庐山的文化至今没有形成产业化、载体化、具体化，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体系。

(三)对长江中游地区辐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从区域角度来看，庐山文化资源优势的带动和辐射能力仍显不足。目前，庐山仅旅游产业发展较为迅速，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不强。庐山亟需以文化资源整合旅游产业、更新旅游产品，并与整合“山(庐山)—江(长江)—湖(鄱阳湖)”生态旅游圈相结合，在保护区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的前提下，应注重突出庐山文化资源的特色和优势，大力加强庐山文化建设，尽快建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大发展的示范区，更好地为带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乃至长江中游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

(四)管理体制尚未理顺，难以有效配置庐山文化资源

从管理体制来看，“一山多治”使得庐山难以统一管理，文化资源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庐山在行政区划上跨越九江市庐山区、星子县和九江县，而且，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庐山自然保护区都对庐山大部分山体拥有各不相同的管理权限。目前庐山的直接管理机构管辖区域为120平方公里，仅占庐山风景名胜面积(302平方公里)的约40%，难以对整个庐山全范围实施有效的统一管理和利用，导致庐山整体保护的各項措施以及优化、整合全山文化资源的工作难以实施到位，阻碍了庐山文化资源的充分发挥。

三、总体定位研究

弘扬中华人文精神的圣地，长江中游以文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标尺，中外文化和谐交流交融的基地。

(一)从千年历史的角度定位

古代至近代，庐山曾经有三个时期体现了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走向。著名学者胡适在1928年指出：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慧远的东林寺，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牯岭，代表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大趋势。

庐山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定位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是中国田园诗的诞生地，山水诗的策源地，山水画的发祥地。(古代诗人留下一万六千余首诗词，其密度堪称中华之最)；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地；是道教殿堂化、规制化的完成地；是中华文化精粹——理学的诞生地。从三国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文化巨匠、政治贤达、民族精英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踪迹。庐山的奇秀孕育出山水田园

文化、诗歌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儒家文化、旅游休闲文化、抗日文化、非物质文化等，几乎涵盖了中华文化的各个类型，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精华。

庐山风光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到最美的大自然中去，让精神无往不至，超脱自我，是中国哲学天地人一体的生动体现。千年的史迹与雄奇秀美的自然高度融合，显示高深的意境和幽远的韵味，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置身其中，使人深感中华山水文化的博大精深，找回对本民族文化和哲学的自信。

回顾历史，庐山文化如同长江之水，波澜迭出，不断出现新的高潮。简言之，东晋南朝是庐山佛道文化的高潮期，唐宋是庐山山水文化的高潮期，清末是西方文化的高潮期，近现代是政治文化的高潮期。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演变中，庐山文化还会出现新的高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迫切需要文化的复兴与崛起，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民族精神。自司马迁②以来，庐山传承着两千余年的历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缩影，发生过诸多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有责任、有义务承担新的历史使命，见几而作，作为中华文化传承与体验地标，为国家、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做出历史性的新贡献。

(二)从文明交融的角度定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庐山以“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给予高度评价：

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会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景观。

自公元1500年航海大发现以后，地球上

各地理单元的人类文明才逐步融合，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才正面接触。英国历史学大家汤因比分析了世界历史上各个文明的特征，他认为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彼此独立存在的文明；美国学者亨廷顿著有《文明的冲突》一书，论述了世界上几大文明的冲突，当今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基督教传承着西方文明的基因，追求“唯一真”，具有排它性，容易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历史上十字军东征就是著名案例。

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胸怀宽广，包容性强，可容纳其他文明的进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庐山正是这一中华精神的代表，经过1600多年的发展，在中华“和”文化的理念下，佛、道、伊斯兰、天主、基督教五教合一，和而不同，在庐山和谐共处，放眼全球，当为翘楚，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

庐山牯岭区域的别墅群，是中西文明碰撞与交融展示的现实载体。西方文化在这里演绎了60多年。20多个国家的传教士、商贾、侨民在庐山建有各种风格的别墅、教堂、学校、医院1000余栋，至今保存完好的仍有600余栋。上世纪上半叶，曾有4000多西方人常住庐山，其中美、英、法、德四国在山上办有学校。至今，美国还有庐山牯岭学校校友会，会员们的家族成员都已成为中美交流的文化使者。庐山恢复牯岭国际学校，吸引国际学生到庐山体验学习中国文化，扩大了中国文化影响力。2009年庐山发起并成立的世界名山协会，中国人担任主席，开辟了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道路。

(三)从空间的角度定位

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是以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构成的“T”字型战略为指导的。长江流域，上海是龙头，龙尾重庆近年来发展迅速；中部区域(龙腰)一直处于塌陷的境地，有一中心城市武汉，经济实力远超庐山，但在文化方面，和人文圣山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加快沿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需要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更加强化，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从国家未来战略格局出发，需要的不是又增加一个重量级经济区，而是需要一个以文化号召力为核心，集人文、经济、生态和国际性于一体的新型战略高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全国，为国家打造一个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为长远的持续发展战略服务。

庐山可以凭借自身独特人文资源和区位优势，构建人文发展综合开发示范区，将文化发展与鄱阳湖区域发展协调起来。以文化核心启动产业，几千年文明和现代文明结合，促进长江中游新经济转型，成为长江经济带中游的一个关键节点。

(下转03版)

从文化和哲学认识论的视角分析当前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深层问题

■ 溪源

(上接01版)

综上所述，从文化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来审视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宏观的大规律，一方面使我们在全球化环境中，知己知彼，树立更加自觉和积极主动的战略意识，在坚信自己优点的同时能更加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不足；同时还将使我们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心中有数，更加善于扬长补短、有的放矢，树立道路、制度和理论自信。更长远看还能在未来全球治理合作新模式的探索建设过程中，树立起有利于我们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

同时，还要看到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碰撞乃至冲突，这是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易经》中谈到“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矛盾双方在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下必然诞生新的事物。因此，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也必然酝酿着重要的历史机遇、成果和重大的战略挑战。既然自然的现实选择了中华民族作为其中的一方，赋予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就勇于担当，敢于作为。既要高度重视挖掘和弘扬我们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重塑我们文化的诠释力和感召力，更要注重融合与扩大东方文明圈以与西方进行对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良性互动。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阴阳互济共生，有很大的回旋空间，不能排斥或者完全对立地看待对方，要善于在两极互动中根据自己的实际，把握好度，善于转化，注重发挥东西文明的综合的优势，主动抢占综合东西方文化优点的这个战略制高点，从而为自己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夯实文化根基，积蓄软实力服务。

三、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审视经济等领域中众多“二”的对应范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众多领域改革的指导意见都有个“分”字当头。从“分田到户”、“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到具体行业诸如医疗

卫生领域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赢利与非赢利性分开、医药分开”，电力行业的“厂网分开、输配分开、主辅分离、主多分开”等。正是这个“分”字，让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使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对待这个“分”字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必须承认和西方分析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着根本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学习和引进西方的这个“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分”与“统”具有深刻的辩证关系，社会是个整体，“分”的目的毕竟是为了整体最优，因为只有整体最优才能真正实现绝大多数个体的最优。因此要特别注意“分”后必须马上跟上“统”的一手，当然这个“统”在本质上已经不同与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的“大一统”，而是可以通过监管、信息技术、法律和人民的道德文化自律而能实现的健康市场秩序及国家社会和谐发展的“大一统”，进而避免因“分”了以后导致“统”不起来而无法实现系统、整体的协调发展的无序局面。

为此，我们当前深化改革就面临着这样一些关键的问题：“分”要分到什么程度才合适？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分”和“统”是最合适呢？也即“分”了以后怎么“统”起来？“分”与“统”的形式、内涵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讲我们必须一方面注意和避免“分”了以后，导致群龙无首无序发展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度地强调“统”而过多地用行政来“统”，进而导致管理低效或使社会缺少活力的停滞局面。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只有紧紧抓住文化中的认识论这个重要的工具来审视，做到“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加倍重视调查研究与时俱进，才能做到“察于心、决于度”，进而始终保持心中为数有积极主动的良好发展状态。

现阶段，我们还将深化改革中面临众多的两极问题，诸如：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包含计划、监管、政策、价格、审批等)、商品与货币、供给和需求、法治与德治、公有与私有等等众多“二”的对应问题。我们看到，一方面，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依然坚信

“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所谓小政府、大市场，迷信看不见的手。经济学中的奥地利、芝加哥学派仍然是主流。在货币与商品的关系上，美元货币已经成为脱缰的野马，试图成为其新殖民的手段，结果已经出现了不少难以克服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的许多主流学者也认为在上述众多的两极中只能执其一端，并进行到底。比如在诸多行业中把市场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认为只有彻底的市场化才是优化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表现在现实中如煤炭开采只要有钱就可以干，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也有了片面地追求市场化的趋势，大有一“化”了之的价值认同。结果是煤炭事故频发，基层官员参股，引发腐败，现实中出现我们根本无法监管和管理到位，以及法律、制度形同虚设，监督者需谁来监督的问题。山西省还似乎参照了历史上的“盐票”制度而出台了“煤票”，但却又被批评以所有制来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上述这些问题的实际根源是对这些“二极”问题的唯理论化和绝对化，似乎“两害相权只能取其轻”，只能落在有“害”之处，而把辩证法、把老祖宗的“执二用中”，把理论联系实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这里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了！

那么怎么来处理这些“二”极的对应问题呢？中国古典哲学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两末”之辩的说法，认为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现实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都在两者之间的“度”上，也就是《管子》一书强调的“度数”和辩证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感。“与时偕行”、“君子而时中”、“天下随时”、“观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先贤的智慧结晶《易经》里也一再强调这个道理。至于怎么才能把握好度呢？那就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我们反复强调的老问题了！曾国藩早已说过：“天下事，需要躬身入局”才能从亲身的感受中提出有益的解决办法。否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老是沉溺于“姓资与姓社”、“公有与私有”、“政府与市场”的“两末”

之辩中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这里提出的文化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无疑是深化改革中绕不过、躲不去的深层问题，它也能深刻地启发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和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重要思想武器的重大现实意义！

四、开展文化创新是我们当下的一项重要战略性任务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背后都有深刻的文化影响。而全球化是个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交融、撞击和取长补短的综合过程。当前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正从生产力的角度深刻呼唤新的思维方式以解决复杂、开放巨系统社会乃至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逢其时，但是这个道路和过程怎么走呢？西方近代的复兴路径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文明复兴、大国崛起的具有一般性规律意义的借鉴。首先西方从罗马法复兴和文艺复兴开始，先是恢复希腊、罗马时代的人文精神，其后在宗教改革方面是处理好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并在宗教自身的发展方面探索出新路。再后的启蒙运动则是吸收了外来的中国的传统自然哲学，从思想上摆脱了宗教的枷锁。最后的科学革命就是遵循依此而树立起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即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和培根的实验的方法，加上固有的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传统)，并以此来审视和构建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秩序，从而从文化复兴走向了全面的社会复兴的。

那么探寻此路径，要实现我们民族的复兴，我们首先就必然要复兴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儒、释、道中的人文精华和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精髓；其次就是要客观地分析东西方文化的优缺点及其在应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优点和不足；再次就是要充分认识“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易经》贲：饰也，指文化)，从而重视通过文化创新来综合其优点，并以此注入现代社会来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和科学创新能力；最后归根结底就

是一定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探寻出一条新道路，并据此来指导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走才能走向全面复兴。

我们注意到一些文化界前辈现在就十分关注这件大事，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说：“《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发更大的光芒。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臼”。

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曾精辟地分析说：“中国传统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西方十六七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大缺陷。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要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的努力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敏锐地认识和把握这个深层次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一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山雨欲来”，他指出这项事业的创作者将是“出生于胡适死后的这个新生代的中国知青”，他还特别说明这不是哗众取宠，“而实在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几十转后的实际心得！”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是个历史悠久、不甘落后、勇于创新的民族。“生生之谓易”，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决心从文化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为自己的文明探索出一条光辉灿烂的未来，相信我们中华民族必将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完)